



坚决扛起载旗责任 助力决胜全面小康

□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党组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使命责任，坚定投身脱贫攻坚战场，强化领导、精准谋划，着力回答好、解决好中央企业“为什么要扶贫、为什么能扶贫、为什么扶得好”的重要问题，坚持真抓实干、投入真金白银、倾注真情实感，帮助广西昭平县和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如期保质脱贫摘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中航力量。

答好“为什么要”扶贫，凝聚决胜脱贫攻坚的强大动力

中航集团党组深刻认识到，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作为载旗航空公司，投身脱贫攻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无上光荣的使命。

从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强动力。典范履行社会责任是成为世界一流的硬性标准。中航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十家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之一，坚持把投身脱贫攻坚作为迈向世界一流必经之路，把定点扶贫与集团生产经营结合起来，做到“三个纳入一个接入”，即把定点扶贫纳入集团创建世界一流实施方案，纳入集团年度战略管理点，把帮扶成效纳入组织绩效考核；构建“8+2”工作机制，集团下属各二级单位承担帮扶任务，实现了集团航空运输业务对扶贫工作的全链条接入，将贫困群众奔小康与集团职工创一流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履行央企职责定位强动力。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发挥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中航集团坚持以服务国家大局为天职，全力当好“顶梁柱”，近年来，集团每年签署定点扶贫责任书，就投入资金、扶贫采购金额、引入帮扶资金等任务，签下军令状，作出硬承诺，不折不扣完成，让党的政策的阳光照亮了山沟草原。2013年以来，累计无偿投入帮扶资金1.1亿元、协调引入资金1420万元，集中采购帮扶县农牧产品超过1.59亿元、帮助销售1883万元，协助当地培养各类党政干部、技能人才6484人次，从帮扶县招聘空地勤员工62名，连续三年在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考核中获评最高等次“好”。

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强动力。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中航集团坚持以党的初心使命凝聚人、以党的组织体系团结人。成立集团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党组书记任组长、党组成员全体进入，把定点扶贫列入党组重要议程，先后召开8次领导小组会研究部署扶贫工作；党组书记带头、班子成员39次赴扶贫点考察，行程近30万公里；干部作表率、党员当先锋，带动全体职工用心用力用情帮扶，10万名职工每年积极采购帮扶县农牧产品；600余人次赴一线调研、

帮扶、支教，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

答好“为什么能”扶贫，发挥精准开展扶贫的专长优势

中航集团党组深刻认识到，帮助当地解决生产要素短缺、产销循环不畅、治理能力不高等致贫难题，是企业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千方百计把集团专长优势转变为帮扶县发展优势。

发挥要素优势，协助当地发展增“本钱”、强本事。多形式、多渠道协助帮扶县强化发展要素。集聚资本要素。通过投入帮扶资金、消费扶贫采购款计提等方式，为当地发展筹措资金，畜牧养殖、茶叶加工等一大批项目落地实施。引入碳交易市场机制，联合专业机构赴昭平县开展碳汇资源认证，助力当地生态资源接入碳交易市场、转化为发展资本。优化劳动力要素。统筹集团内外培训资源，开展了电子商务、酒店服务等技术培训，针对性强、效果好。引入技术要素。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协调引进生态产业技术，在苏尼特右旗探索以草产业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在昭平县发展林下经济，探索了生态保护、精准脱贫“两场攻坚一起打”，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两座大山一起攀”的帮扶新模式。

发挥产业优势，协助当地产业走出去、立起来。落实中央消费扶贫政策，当好帮扶县通往全国市场的桥梁。以“小循环”联通“大循环”。依托集团工会组织、自有电商平台、航食配套，号召职工采购、带动客户采购，帮助两地实现农牧产品销售额大幅增长，以企业内部“小循环”为当地产品提供了稳定的市场和渠道，为进一步联通全国市场“大循环”打牢了基础。以“需求侧”倒逼“供给侧”。以推动帮扶县提升供给质量着力点，严格按照集团采购标准开展消费扶贫，向当地引入现代化供应体系、协助制定高质量供应标准，在职工采购中引入供应商末位淘汰制，促进当地产业链持续提质增效。以“大品牌”背书“小品牌”。以集团平台为窗口、以集团品牌为纽带，采购帮扶县农牧产品制作航空餐食，推出“牛羊上蓝天”“茶香飘香舱”，大力开展宣传推广，让两地特色资源品牌更亮、含金量更足。

发挥党建优势，协助当地党组织强领导、促发展。落实中央抓党建促脱贫部署，为加强和改进党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提供支持。乡村强了“主心骨”。先后选派3批优秀干部赴昭平县江口村任“第一书记”，协助村委当好脱贫攻坚的主心骨，一批集体经济项目进展顺利，村集体收入突破40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示范村。产业强了“排头兵”。把协助昭平县做强国有经济作为主攻点，推动当地整合产业资源，组建县级国有企业“将军峰”集团，通

过引入先进技术、合作帮扶项目、培训管理人员，协助该企业提升集约化、品牌化、规模化经营水平，逐步成长为产业“龙头”，带动发展效果显著。攻坚强了“战斗队”。紧盯“关键少数”，把当地干部“请过来”参加集团干部培训，在中央党校等单位支持下“送学上门”，协助建强人才队伍，强化脱贫攻坚的组织保证。

答好“为什么扶得好”，持续深化行之有效的帮扶经验

中航集团党组深刻认识到，决胜脱贫贵在精准，要创造性地把企业专长优势同帮扶县资源禀赋精准对接起来，走一条落实中央要求、符合地方需求、发挥央企优势的帮扶之路。

赋能与补血并重。把提高发展能力与补齐发展短板结合起来，使贫困群众实现自我发展、参与发展、共享发展。“授之以鱼”补血气。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积极参与苏尼特右旗“救急难”项目和昭平县“百县万村”工程，援建安全饮水、村级扶贫光伏电站，捐建红十字博爱卫生院、站，修缮校舍、捐助助学，有效缓解了饮水难、出行难、用电难、看病难、上学难的状况，极大提高了群众获得感。“授之以渔”壮筋骨。坚持“扶贫不是救济慈善”理念，有针对、成系统地向当地注入资本、技术、人力、市场、品牌、治理、理念等要素，实现有效赋能，协助贫困群众增厚自身造血功能。

主业与跨界并举。用足航空运输主业资源，带动各方积极参与，建好脱贫“朋友圈”。盯主业、做加法。把帮扶县特色资源“加入”到集团主业链条中来，实践了一条空地协同作战的“航空+扶贫”特色帮扶模式。重跨界、做乘法。汇众智、聚众力，先后邀请和带动一大批专业机构、知名企业参与帮扶县脱贫攻坚，汇聚同舟共济正能量，激发帮扶乘数效应。

外力与内力并进。用好外力、激发内力、形成合力，以同心同向促行稳致远。扶上马、送一程。多措并举帮助贫困群众“点火起步”。强信心、长志气。坚持扶贫先扶智、重扶志，通过开展音乐扶贫、“中航蓝天课堂”志愿支教等，努力把帮扶县青少年培养成敢“追梦”、能“圆梦”的时代新人，为可持续发展育苗、强根、筑梦。



党史上的为什么（9）

抗日根据地为什么要开展大生产运动？

□ 罗平汉

1940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次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致使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同时完全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以图就此逼中国共产党就范，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发展。不但如此，蒋介石还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严格限制与根据地的货物人员往来。

1940年起，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连续发生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1940年底“百团大战”结束后，日军又加强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损失，敌后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大为减小。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大岳区在最严重的时候，全区没有一个完整县，已建立的12个县政府，被迫搬迁到沁源县工作，后来沁源县城也被日军占领，全区没有一座县城。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约40万人，各抗日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

1940年和1941年，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后来毛泽东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对于可能出现的经济困难，党的领导人并非没有预计到。1939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干部晚会上强调：“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给，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生产运动的准备问题。12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还发表了《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社论。1939年1月2日毛泽东为

《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发刊词，亦明确提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他还提出要通过开展生产运动来解决和改善根据地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1月25日，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在延安拉开帷幕，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在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努力生产，“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军队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随后，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和学校等单位纷纷组织生产运动委员会，开展生产运动。

为了度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采取了开源与节流并举的方针。所谓开源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各根据地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所谓节流就是大规模的精兵简政。

从1941年起，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奇迹”。1940年5月，朱德从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提出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政策，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并亲自到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实地考察。1939年秋，八路军120师359旅从晋西北调到陕甘宁边区，驻防绥德。经朱德建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1941年3月，该部从绥德进驻南泥湾，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展大生产运动，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40年前，该旅的经费全由政府提供，而1941年经费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达90.3%，1943年为91.3%，1944年实现了全部自给。陕甘宁边区其他部队的经费自给率也逐年增加，到1943年，警备一旅经费自给率为75.4%，警备三旅自给率为59.9%，358旅自给率为70.7%，独一旅自给率为74.6%。1942年边区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生产收入2581万元，自给了48%，边区机关如保安处生产收入113万元，自

给率70%。正如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所说的：“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火盆、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给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给了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

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开展了广泛的大生产运动。1940年，晋绥军区的经费中，政府拨给的占96%，生产自给仅占4%，1944年生产自给达到30%。到1944年，山东根据地许多主力兵团除被服鞋袜费外已达全部自给。1945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抗战时期的历史时，对大生产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大生产运动对于各抗日根据地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坚持抗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都对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发表重要论述、作出重大部署，为我们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指南。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是昆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治理好滇池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最直接的行动、最有力的举措。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滇池保护治理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一把手”工程、大事要事来抓，坚持“四个治滇”，推动“六个转变”，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推进滇池保护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滇池这颗“高原明珠”正逐渐重焕光彩。

坚持“四个治滇”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们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组织科学论证，在深入总结前一个历史阶段滇池治理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治滇、系统治滇、集约治滇、依法治滇”的工作思路，进一步明晰了滇池保护治理的方法路径。

坚持科学治滇。科学决策的基础是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摒弃成见的集思广益。2015年以来，我们摸清滇池保护治理的现状，找准造成滇池污染的原因，为滇池保护治理提供了科学支撑。在深入调查研究、科学量化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工程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等各种技术手段，推进实施污染源头控制、河道综合整治、河口末端治理以及河道、管网、污水厂、环湖截污系统、雨污调蓄系统联动运行，不断提高滇池保护治理科学化水平。

坚持系统治滇。把滇池保护治理纳入城市治理体系，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各领域、各环节，切实提升滇池保护治理工作的系统性。在城市规划建设上，推进“多规合一”，疏解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实现滇池保护治理和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在城市管理上，把滇池治理纳入“智慧城市”网格化管理体系，全面构建截污治污系统及精细化管理系统。在水系统上，把滇池湖体系统、河道系统作为统一的生命共同体，强化源头控制、河湖联动、综合施策，整体推进滇池保护治理。在生态小系统上，统筹陆域和水域，统筹抓好山体、林地、田地、池塘治理，加快推进小生态与大环境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坚持集约治滇。以精准、高效、规范、节约为导向，最大限度发挥资金、项目等的使用效益。通过对新上项目进行多方案比选，优选投资少、减污效益高的方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通过优化已建工程运行管理、提能增效，实现工程效益最大化。通过采用低耗、绿色、高效的最佳适用技术，对关键污染物进行源头减排，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对滇池的污染。

坚持依法治滇。严格落实一系列配套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为加强滇池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防治水污染提供制度保障。创新出台相关配套文件，在滇池流域推行河道生态补偿机制。坚守保护红线，严格项目审查程序和准入类型，从严控制流域内各类存在污染风险的新、改、扩建项目。建立“一条河道、一名督查专员、五名执法人员”的入滇池河道执法队伍协同配合联动监管机制，定期开展集中联动执法，对各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

推动“六个转变”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坚持统筹兼顾、系统推进，多措并举、多管齐下，按照“技术上综合、管理上严格、治理上广泛”的原则，着力推动滇池治理在工作内涵、工作理念、工作方式等方面彻底转变，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效。

推动工作内涵由单纯治河治水向整体优化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按照“量水发展、以水定城”的城市发展思路，综合考虑滇池流域环境容量和承载能力，统筹规划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优化流域生产力和人口空间布局。推进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绿色产业，大力倡导绿色、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源头上减轻污染负荷。

推动工作理念由管理向治理升华。研究制定《昆明市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构建“四级河长五级治理体系”，“一河一策”大力提升河道水质。积极搭建公众参与平台，通过开辟“滇池治理”网页、微信公众平台、视频专栏等多种形

让高原明珠重焕光彩

□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程连元

式，实时反映全市河道水质断面指标情况，进一步畅通公众参与渠道。组建百名“市民河长”、千支“爱湖志愿服务队”、万名“滇池卫士”及“滇池驴友”四大志愿服务队伍，通过聘请社会监督员等多种方式，引导群众关心爱护河湖库，加快形成政府主导、全民参与、专业治理、协调联动的河湖库保护治理新格局。在中小学及高等院校试点“学生河长”制，参与师生及带动家长近万人。

推动工作范围由河道单线作战向区域联合作战拓展。加强流域相关、地理相连的河道之间区域协作，在“一河一长”或责任区域配备河长的基础上，对跨行政区域河湖明晰管理责任，加强系统治理，实现联防联控。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加强区域内河湖库问题会商办，每季度由总河长召开现场办公会，协调解决涉及的突出问题。建立实时、公开、高效的河长即时通信平台、河湖库管理信息平台，推进信息共享，实现基础数据、涉河工程、水域岸线管理、水质监测等信息化。

推动工作方式由事后末端处理向事前源头控制延伸。坚持源头治理和重点整治相结合，推动水域、陆地共同发力，区域、流域联合行动，多部门、多行业携手，实施工矿企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水、畜禽养殖污染、农业生活垃圾及污水、农业化肥农药污染的综合防治，实现对污染源头的全面管控。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地创新和改进保护治理方式，深入开展水质净化厂出水提质、分散式水处理装置配备、城市“双修”、海绵城市建设等源头提升工作，提高工程效益、提升治理效率。

推动工作监督由单一监督向多重监督改进。市级成立全域河湖库保护治理管理日常工作专项督导组，各县（市）区和开发（度假）区、乡镇（街道）成立相应的日常工作专项督导组，积极构建三级专项督导体系。各级人大常委会定期不定期对治理保护工作进行调研，对河长制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察。发挥政协智力富集、联系广泛的优势，组织专业人士对治理保护措施进行调研，提出技术性建议。通过建立河湖管理保护信息发布平台，在河道岸边设置河长公示牌，标明河长姓名、职责、概况、目标、监督电话等信息，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推动保护治理由政府为主向社会共治转化。发挥好政府作用，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守住水资源三条红线，科学制定用水效率指标体系，加强用水定额和计划管理，逐步实现水资源占补平衡。发挥好市场机制作用，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吸引企业和社会资金参与水利项目建设、管理、运营，实行河道维护管理市场化运作，形成河湖库保护治理多元化投入机制。

通过近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滇池水质明显好转。滇池的生态、景观、环境效益不断显现，各种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滇池土著鱼类越来越多。消失多年的海菜花等水生植物，以及金线鲃、滇池银白鱼等土著鱼类重新出现，濒临灭绝的国家珍稀鸟类彩鹇和白眉鸭、消失30多年的野生鸬鹚再现滇池。下一步，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始终坚持“四个治滇”，持续推动“六个转变”，努力把滇池打造成为生态之湖、景观之湖、人文之湖，重现“高原明珠”的秀美风光和迷人风采。